

明清拟话本小说物欲书写的宗教关怀

杨宗红

(广西贺州学院中文系, 广西贺州, 542800)

摘要: 明代中晚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逐利之风盛行, 并进一步影响到小说的物欲书写。明清拟话本小说物欲书写充满浓厚的宗教意识, 小说家在这些宗教意识层面上表达了对人本真生命与社会伦理的关怀, 以及重建道德秩序的愿望。

关键词: 拟话本小说; 物欲书写; 宗教关怀

明中晚期, 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 商品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世俗以利为重, 金钱成为衡量人们价值的重要法码: “凡是商人归家, 外而宗族朋友, 内而妻妾家属, 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 尽皆爱敬趋奉; 得利少的, 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二刻》卷三十七)张瀚提及福州、会城、建宁、福宁时说: “民多仰机利而食, 俗杂好事, 多贾治生, 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 被服不足自通, 虽贵宦巨室, 闾里耻之。”^[1]即使士大夫之家亦盛行求利逐利之风: “虽士大夫之家, 皆以畜贾游于四方”^[2]; 徽州“人庶仰贾而食, 即阔阔家不憚为贾”^[3]。“吴人以织作为业, 即士大夫家, 多以纺织求利。其俗勤啬好殖, 以故富庶”^[4]。甚至有些儒者干脆弃儒从商, 如《初刻》卷二潘甲“已自弃儒为商”; 《初刻》卷十五中陈秀才“将余财十分作家, 竟成富室”。《恒言》卷三三中刘君荐“先前读书, 后来看看不济, 却去改做生意”。明代中叶后“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的“士商对流”的情况相当普遍。

拜金主义的盛行, 一方面导致贫富差异日益扩大, 阶级分层更为明显, 社会矛盾加剧, 一方面又社会风气的败坏, 社会道德秩序被践踏, 人心不古, 世风不古。小说家通过物欲书写, 在展示时代风尚的同时, 更希望寄托于宗教教化, 改变世道人心。

—

明末清初的拟话本小说中的物欲书写, 具有浓郁的平民化特点, 走夫贩卒、三姑六婆、僧道尼冠活跃于小说中, 不同程度的诉说着他们的物欲企羡。话本小说中的物欲书写, 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其一, 神助型。在这类叙事中, 主人公因为意外际遇, 得遇神明, 在神的指点下, 经商营业, 无不有获。《二刻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中, 徽州商人程宰外出经商, 忽遇海神, 四五年间, 赚了五七万两, 三次遇难均得海神指点而获救(下文简称《二刻》)。《二刻醒世恒言·黑心街小戏财神》中的淳于智贫困潦倒, 连仅得的十五两银子也保不住。当财神召回穷鬼, 亲自跟随淳后, 淳事事皆顺, 功名富贵皆得。

其二, 命定型。人的形体相貌注定其命中的财禄, 何时得财, 得多少财都是命中安排。命好则福禄深厚, 命薄则贫困终生。《初刻初刻拍案惊奇》(下文简称《初刻》)卷一引用俗语道: “命若穷, 掘得黄金化作铜; 名若富, 拾着白纸变成布。”入话诗又云: “分内功名匣里财, 不关聪慧不关呆。果然命是财官格, 海外犹能送宝来。”《无声戏·失千金福因祸至》中和秦世良家事萧条, 向杨百万借五两银子。杨百万善相人, 说秦世良无论做什么生意、不用花一些力气都只管趁钱, 先借给秦世良借五百银子, 后又再借给他五百。而对与秦世良长得十分相像的, 且颇有家产的秦世芳却五两银子也不借, 说他百金也留不住。秦世良做生意, 不是被抢, 就是银子被别人拿走。谁料, 被抢被丢的银却给他带来大利, 秦世良做了现成财主。

秦世芳做生意，老本全无，真个“百金也没有留住”。《初刻》卷一入话中的金老，费劲辛苦，集攒得八个大锭，不胫而走，其原因，乃是命薄无福消受。

其三，善恶报应型。从哲学的角度而言，物欲本身没有善恶的属性，但物欲追求的过程却有善与恶的选择。善恶报应型是话本小说中出现最多的物欲书写范式，又可分善报与恶报型两种。善报型包括拾金不昧得报型、乐善好施型、诚实经营得报型等。

拾金不昧得报型。这类人本身很贫穷，但因为偶然拾金，交还失主，后来命运得到改变，成为大富。典型的《警世通言》之《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初刻》之《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中的郑兴儿等。

乐善好施得报型。这类人主要是家中小有财及广有财者和一些稍有资本的商人，他们或广施家财，或捐资助人，或修路架桥等，最后得到善报，有的成仙，有的无子得子，有的免于灾难，有的成为大富。《二刻醒世恒言·龙员外积善遇仙》中的龙员外家资巨富，买卖公平，好行善事，“开一盘典当铺。待人公平，真是童叟无欺，人人称赞，连年生意兴旺。”又将余得的米，用来济荒，不知救活了若干人性命。后来龙员外夫妇俱成仙而去。《二刻》卷十五中，一女子因救命之财被骗要跳水，被一徽商见到，慷慨解囊送给她二两银子救了性命，徽商因经得住该女半夜“踵门叩谢”的诱惑，躲过了一场飞来横祸。《无声戏·变女为儿巧菩萨》，盐商施达卿年近六十，尚然无子。受菩萨指点，于是施达卿救穷苦，修路、铺桥、建庙，赈济饥民，救治病人，最后如愿以偿。

诚实经营得报型。《西湖二集》卷二四头回中，开酒店的王公“一生平直，再无一点欺心之事。若该一斗，准准与人一斗酒。若该一升，并不手里作法短少人的。又再不用那大斗小秤，人都称他为王老实。”感动火神，在建康大火中，王公酒店得免。

在恶报型中，主人公或为富不仁，吝啬、欺心害人，或忘恩负义，最终受到恶报。恶报型物欲书写中又有欺心侵财受报型、杀人越货受报型等。

欺心侵财受报型。欺心之行众多，侵吞他人财物方式也多种多样。有耍手段欺骗他人，夺得他人钱财者，如《二刻》卷十六头回中林氏夺夏主簿经营利息事和正话中毛烈赖陈祈赎金“三千金”事；有将他人所寄存的财物变为己有者，如《初刻》卷三五入话中张善友妻瞞尚将抄化所得银六十两事；有为谋夺他人财产，挑起是非者，如《二刻》卷二十头回中陈定妻舅巢大郎事情；有借他人钱财昧心不还者，如《通言》之卷二五中的桂迁赖施济三百金之事，《二刻》卷二四中缪千户赖元自实三百两银子事。欺心侵财行为受到惩罚也是多样的。就上面的例子而言，有财物主人转世讨债，要回前生财产，有时还一点“加利息”者，如张善友事；或者财主主人告于神灵，侵财者受惩治，如夏主簿事与毛烈事；有亲人变异类者，如桂迁事。等等。

杀人越货受报型。此类故事主要是主人公杀人越货而他人不觉，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杀者通过轮回转世，或者通过附体，报了被杀之仇，杀人者所得之财又归于被杀者的亲人或后世之身，典型的如《初刻》卷三十头回中两事及《型世言》第三五回无垢事。

在上述叙事模式中，均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神有时出现在小说文本中，有时又隐藏于幕后，无时不刻不在关注着世人的行动，监察世人的善恶之行，并给予相应的奖罚，其“聪明正直”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展示。在具体故事中，民众所信之神不一。就前面所举例而言，帮程宰的是海神，施达卿信准提菩萨，火神对王公网开一面，夏主簿到地府伸了冤，陈祈到社

公和东岳神前诉冤屈后又得阎王审案，淳于智因财神而如愿……因为神的参与，主人公的财运得到显著变化。

叙事模式是民族心理意识以及艺术审美的定型化，神明、神异现象参与物欲书写，反映了民族民间信仰多样性及现世性，它们相互交织，使得物欲叙事摇曳多姿而又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二

物欲追求乃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来面目”。对于合理的物欲追求，儒释道三家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此处，按照一般人的看法，仍将儒家亦视为宗教）。早在先秦，儒家就承认人的物欲乃是人之本性。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认可“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蓄聚有数，车器有限”等人类的基本人欲（《孔子集语·齐侯问》）。荀子也认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的。朱熹认为饮食、夫妻都属于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佛教也认为基本的物质需求是必要的。《阿含经》四句偈：“一施悲和敬，二储不时需，三分营生业，四分生活用。”因此，佛教认可信徒们获取正当的财富，认可将本求利、勤劳赚钱之行。《杂阿含经》云：“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牧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道教有财神信仰，并有专门的求财法术，如《太上正一盟威法篆》“太上招财镇宝妙篆”载，佩招财神符可招五方钱财，佩镇宝神符可使钱财不失，六畜兴旺，万厄不侵，佩佑神符可使不断进财。对物欲的书写，不仅合符世俗人性，也与宗教的现世关怀精神一脉相承。

重视生命，是宗教的现世人生关怀的主要表现。佛教关注个体生命的苦与乐，要求人们重视生命，爱惜生命，提升生命的价值。道教贵生，主张万事万物要遵循“道”，而“道法自然”，个体生命的苦乐、长短、生命的终极等都成为其关怀的对象。阳明心学与老、释关系非常密切。阳明曾言：“二氏（佛、老）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5]晚明心学兴盛，促进了佛道的世俗化，人间化，佛性自性、道法自然均可以作为话本小说物欲书写的注脚。

儒、道、佛都关注人之为本真的问题。物欲书写中，对生命本真的关怀体现在对“治生”的问题描写上。冯梦龙在《古今谭概·贪秽部》中说“人生于财，死于财，荣辱于财。无钱对菊，彭泽令亦当败兴；孔氏绝粮而死，还称大圣人不？无怪乎世俗之营营矣。”^[6]李贽高唱“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7]贫穷卑贱者如小手工业者施复、奴仆郑兴儿、小本买卖者王公，倒运汉文若虚，穷人贾仁；显达者如盐商施达卿广有家私的龙员外……高贵与卑贱，贫穷与显达无别，走卒贩夫、僧尼道观都成为小说家关注的对象。

趋利避害为本真，发于心的仁义礼智四端也为本真，道家的价值取向关注人的自身和性命，佛教则说自性本来是佛。生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是人本性的三个方面，按照需要理论，生物性是最基本的，是后面二者的前提，后面二者又是人之异于其它动物的本质特征。因此，小说家在展示物欲世相，展示世俗社会的物欲追求中，更关注人的情感需求与追求，关注人行为的价值取向。如《初刻》卷三五中穷汉贾仁对东岳神的诉告：

小人想，有那等骑鞍压马，穿罗著锦，吃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贾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烧地眠，炙地卧，兀的不穷杀了小人！小人但有些小富贵，也为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上圣可怜见咱！

再如郑兴儿拾到二十多包银子时心理：

解开看，乃是二十多包银子。看见了，伸着舌头缩不进来道：“造化！造化！我有此银子，不忧贫了。就是家主赶了出来，也不妨。”又想一想道：“我命本该穷苦，投靠了人家，尚且道是相法妨碍家主，平白无事赶了出来，怎得有福气受用这些物事？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带了来用，因为登东司，挂在壁间，失下了的，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我拿了去，虽无人知道，却不做了阴鹭事体？毕竟等人来寻，还他为是。

阳明心学肯定人的主体性，认为良知乃不习不虑，自然有之，不假外求，也即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物义”（《传习录》一），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事虽万殊，理具于心。“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8]如此看来，心就是良知，事就是良知统摄下的道德性行为，理与义就在心与事之中。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反观贾仁与郑兴儿的心态与行为。贾仁的心态实际上表现了两个方面：对衣食住行的渴求与日常行为的道德认知。小手工业者施复在大街上捡到一包六两白银时心态与郑兴儿相似，都是开始狂喜，设想有这些银子后的生活，但同时又推己及人，想象失主的心态及其可能的遭遇，于是主动寻求失主。这种心态，反映了本性的三个层面：狂喜，不忧贫（进而设计今后生活）这是生物性层面，是基本物质的满足；考虑丢失银子对失主的影响，推己及人，考虑“阴鹭”，物归原主这是社会性层面与精神层面。三个层面都源于生命本真的仁爱，而这正是行动的内驱力。

对于作者与读者（听者）而言，在对物欲狂欢化的描写中与听说或阅读中，世人（包括作者）可以“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潜藏于心的好物、好货的被压抑的心态得到纾解与满足。通俗化以娱人以求利，结果，小说“不胫而走”，“行世颇捷”，给小说家与书坊主带来的利润足以治生。娱己以消忧，物欲书写宣泄的物欲企求的情感，对物欲追求的种种行为及其果报反观，足以令人平静沉思，从而让心灵得到安顿。

出于对生命本真的关怀，不论物欲追求是否符合“道”与“自性”，它都是小说家所关注的。凡是符合“道”“天理”的欲求都被肯定，并给予现实生命所企求的满足：功名、富贵、长寿、多子、成仙、进入净土等，不合“道”“理”的欲求则被否定，其结局也就相反。三教的慈悲、仁爱、救度都在其中得到印证。

三

三教虽都认为物欲需求是人之本性，但都反对毫无节制的纵欲行为，认为过于追求物欲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害。道家在《道德经》第十二章指出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都有害于人心。第七十七章提出，人应学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八十一章又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教承道家而来，反对悭吝，要求世人扶危济困。《云笈七签》卷三九云：“修斋求道当奉十戒”，其第二戒便为“守仁不煞，悯济群生，慈爱广教，润及一切。”《文昌帝君阴骘文》劝人济急救危，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所以，道教反对独占财物。独占财物而不恤鳏寡孤独者将受到惩处。《太平经》告诫众人，倘若积财亿万，而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亦是大罪，“罪不除也”。佛教认为钱财虽是生活必须，但亦不能过于执着，不能悭吝，要将慈悲之心化为布施。在佛教的菩萨行中，布施为第一，是菩萨成佛

的最重要的实践。《华严经》载：“若有众生贫穷困乏，来至我所，而有求索。我开库藏，恣其所取，……汝等贫乏，若有所需，当来我所，及四衢道一切诸物，种种具足，随意而取，毋生疑难。”并要求布施，不求有所回报。

话本小说物欲书写有两个心理维度，其一，关注的是心灵的协适，展示人之本性，以此娱人娱己，治生适意。其二，通过话本小说的教化作用，让世人明白如何看待物欲，让物欲回归正轨，实现救世理想。在第一个维度中，欲望成为小说的张力，其间流淌着的是小说家与民众的物欲企羨，伦理道德被无意识地弱化，被置于边缘地位。然而，儒家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佛道的“善”意识的浸润，以及官方话语的无处不在，话本小说中的物欲书写虽关注人们的现实处境，但面对物欲横流的世态面对普遍的价值困惑，它更表现出强力的导世之音，物欲书写的第二个维度被凸显。

虽然，私欲之心乃人类真心，“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焚书·童心说》）具有普遍性与合理性，但是，物欲行为中，存在普遍的“应该”问题，这就是道德。在上面的书写模式中，叙述人以全知全能视角告诉读者，主人公在做什么，结果如何，为何有这种结果。其中包含着道德因素，即：问题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前者是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对事实的道德评判，即善恶寓于事实之中。虽然，不同的情景指向不同的道德内涵，但总体而言，公平、正直、诚实不欺、重诺守信等则是被提倡的，而恃力强夺、欺诈偷盗、为富不仁、悭吝不施等则被否定。海神告诫程宰：“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祸……你若要金银，应你可自去经营。”秦世芳命中虽无多余钱财，但因为不欺心，遂沾了秦世良的光，也颇有余财。小说给轻财重德、以财行善者予以好报，给重财轻德、败德者予以恶报，均表明了创作主体的价值导向。

小说家通过故事，既满足了人性中私心，也让读者了解具体情景中“应该”如何（善）不“应该”如何（恶），形成道德认知。同时，又以说话者身份对故事进行干预，强化这种道德认知。郑兴儿还金，被失主郑指挥收为养子，后应袭冠带，以指挥职听用，其儿子也得世荫。小说插话道：“只因一点善念，脱胎换骨，享此爵禄。”巢大郎后来得病而死，“此是贪财害人之报。”《醒世恒言》卷三十三中，因一文小钱连害十三命，作者在入话中议论道：“不争闲气不贪钱，舍得钱时结得缘。除却钱财烦恼少，无烦无恼是神仙。”结尾又有诗云：“相争只为一纹钱，小隙谁知奇祸连。劝汝舍财兼恶气，一生无事得安然。”《警世通言》卷五中的布商吕大郎还金，得遇丢失多年的儿子，救他人反救了自己亲弟，“皇天报应，的然不爽。”

对道德的关注多源于道德的缺乏。物欲横流蒙蔽了人太多的本性，导致社会的道德危机。陈祈为了不让年幼的弟弟长大后与他争家财，将良田美地假装典当给毛烈；巢大郎为谋姐夫财产，诬告姐夫；缪千户借好友纹银，居然在好友落难时不还；桂迁落难之际受施还支助，当其显达后却又不还所借之银，并弃贫困潦倒的施还之子而不顾；滕大尹则假借鬼神之名，谋得倪太守留给弱子遗产五百金（《喻世明言》第十卷）；更有甚者，视他人性命如草芥，杀人越货。“利心一发，则虽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反心而不顾”^[9]，亲情泯灭、友情丧失、官德沦丧、社会公德败坏。只要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必然普遍的关注一切事物并读取其中的道德意义，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寻求契合，必然在关怀自我的同时也关怀他者，完成自我的道德实践与社会的道德重建。

话本小说的作者在对故事的讲述中，让每个读者感受到道德在社会中普遍性及其重要性通过恶报形成一种强制力量，使一切败德行为破产，并使之受罚。病痛、丧子、贫困、化异类、遭杀戮……种种恶报从反面保证善行的施行。桂迁妻、子变狗，巢大郎惊惧之中得病而死，缪千户遭兵害，毛烈欺心下地狱受刑，《警世通言》卷十五头回里，轿大户积年开典获利，“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如此刻剥贫户，以致肥饶。”结果遭雷击，家事尽毁。话本小说力图通过善恶报应的形式告诫世人，所有财富的来源于占有有鬼神监督，都被鬼神纳入善与恶的道德范畴之内，个体行为时刻受到道德拷问。过度追求物欲满足的结果是让其它更有价值东西遭到毁灭，代价不可不大。

报应有时与钱财命定相联，小说家如是写的主旨无非是让世人顺命而行，非己之财不取，非礼之财不拿，因为“得失荣枯总在天，机关用尽也枉然。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初刻》卷三三）否则，将受恶报。以“财欲”的空幻无凭据、富贵无定准而善恶报应真实不虚，如影随形来达到“喻世”、“警世”、“醒世”、“觉世”、“警悟”等劝谕。正如梦觉道人《三刻拍案惊奇》序云：“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理道，宜认得真；贵贱穷达酒色财气之情景，须看得幻。”^[10]

虽然，小说以命定、神助、善恶报应来宣扬物欲伦理性，力图对沦丧的伦理的重新建构有其局限性，但读过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明白物欲是必须的，物欲追求过程却必须符合普遍的价值，符合公众道德，过度的追求物欲却是有害于身，有害于家，有害于社会。明白这点，小说家的“醒世”、“觉世”目的也就达到了。

参考文献

- [1] 张翰. 松窗梦语（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97：84
- [2] 归有光. 归震川全集·白庵程翁八十寿序[M]. 世界书局，1936：169
- [3] 唐顺之. 川先生文集·程少君行状[M]. 四部丛刊本
- [4] 于慎行. 谷山笔尘·相鉴（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97：39
- [5] 吴光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289
- [6] 冯梦龙. 冯梦龙全集·古今谭概[M].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282
- [7] 李贽. 焚书·续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
- [8] 王阳明. 传习录[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2-13
- [9] 郎瑛. 七修类稿·卷17·义理类[M]. 上海上海书店 2001：172
- [10] 丁锡根编著.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791

The Religious Solicitude of Material Desire in Ming-Qing Vernacular Novel

Yang Zong-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 Zhou university, He Zhou 542800)

Abstract: There are two reasons that Wutong womanize. The first one, Wutong are belong to ghosts and gods, as well as monsters, their vicious habits of lechery are only instincts of inheritance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ir same species; The second one, the pursuit of money and the women' repressed desires provide Wutong many opportunities to seduce female.

Key Words: Wutong; Lewdness; Reasons